

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若干问题

上 册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

目 录

| | | |
|------------------------------------|------------|---------|
| 第一讲 战后国际共运的回顾与展望 | 黄安森 | (1) |
| 一、战后国际共运的特点和研究的重点 | | (1) |
| 二、战后国际共运时期的划分..... | | (4) |
| 三、当前国际共运的一般情况及对今后国际共运发展趋势的展望 | | (16) |
| 第二讲 法共意共为争取新的民主制度的斗争 | 黄安森 | (19) |
| 一、战后初期国际共运的基本形势..... | | (19) |
| 二、战后斯大林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 | (25) |
| 三、法共意共放弃人民武装的一些情况 | | (26) |
| 四、法共意共为实现新的民主制度的斗争..... | | (34) |
| 第三讲 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 | 黄安森 | (42) |
| 一、情报局的两次会议 | | (44) |
| 二、苏南冲突 | | (49) |
| 三、情报局的经验教训 | | (65) |
| 第四讲 南共联盟历史若干问题 | 林桂馨 | (71) |
| 一、南共在战斗中成长 | | (71) |
| 二、南共为国际共运中各国党关系新准则而斗争 | | (81) |
| 三、南共联盟对吉拉斯的批判 | | (89) |
| 四、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 | (100) |
| 第五讲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 校纪英 | (113) |

| | |
|-----------------------|---------|
| 一、为什么要讲苏共二十大 | (113) |
| 二、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 | (114) |
| 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对斯大林的评价 | (119) |
| 四、苏共二十大的功过 | (130) |

第六讲 波兰匈牙利事件及其教训 杜康传 (134)

| | |
|----------------------|---------|
| 一、研究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现实性 | (134) |
| 二、1956年波兰匈牙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137) |
| 三、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教训 | (165) |
| 四、波兰匈牙利的改革道路及其不同结果 | (176) |

第七讲 印度革命和印度共党 王朴安 (188)

| | |
|---------------------|---------|
| 一、印度革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地位 | (188) |
| 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 (192) |
| 三、印度共产党成立后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 (204) |
| 四、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共产党 | (231) |
| 五、印度革命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 | (250) |

第八讲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刘玉萼 张阁林 (254)

| | |
|-----------------------|---------|
| 一、日本的概况 | (256) |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 (261) |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 | (286) |
| 四、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设想和对日本革命的展望 | (336) |

第一讲 对战后国际共运的回顾与展望

黄 安 森

战后国际共运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段期间的共运内容丰富，头绪繁多，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提法变化都比较快，极不易掌握。

战后国际共运的特点、重点是什么？阶段如何划分？目前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尚无定论，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粗浅认识，供同志们参考。就我个人来说，这些认识也不是定论，今后随时间的推移，资料的充实，研究的进展，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认识，今天讲的只是我个人学习中体会到的某些认识，提供出来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战后国际共运的特点和研究的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根本特点是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曾经形成过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影响战后国际共运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标志着国际共运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正在许多国家逐步变成现实，变成为社会制度。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就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我们去研究。如果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的状况，就等于没有研究战后国际共运。尤其是对中国、苏联两个大的国家、大的共产党的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发展，对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然国际共运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不是从纯政治经济学角度，而是从政策角度，从政治学角度、历史学角度去研究。

另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可以说是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展

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橱窗。它们建设的好坏直接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对各国劳动人民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建设好坏的首要标志是看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比资本主义提供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在精神面貌上也高出于资本主义社会，要有更好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按12大文件精神说法，要抓好两个“文明”的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我们可以说，过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政治、精神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前进的力量源泉，也是吸引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重要手段。相反，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搞得不好，对其他劳动人民就失去了吸引力，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就会找到更多借口反对社会主义。比如不久前，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曾宣布不害怕社会主义了，也就是说他敢于和社会主义争高低了。战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社会党国际也有了某些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一、二十年的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技术上都有不少进展，国内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给这些思潮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因为战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苏联的霸权主义、中国的十年内乱、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等等，这些都有损国际共运的形象，这些都为国内外敌对者所利用。

战后几十年来国际共运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个人崇拜曾一度盛行。这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在国际共运中搞得最厉害的有两段时间，一是斯大林晚年；二是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的流行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除俄国、旧中国经济生产落后，政治不民主这些因素的残余影响之外，还有其现实的社会原因：一是有人搞，鼓吹个人崇拜，如赫鲁晓夫、林彪、康生等人狂热鼓吹，以便拉大旗作虎皮；二是有人信，这主要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阶级觉悟不高和旧意识的影响，盲目接受了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三是有人欣赏：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欣赏这些东西。毛泽东同志晚年不仅未及时制止这些东西，反而认为在一定时期这样搞是有必要

的，从而助长了个人崇拜的流行。个人崇拜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有损于共产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是大党主义、老子党作风曾一度盛行。这种恶劣作风，强加于人，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斯大林晚年就有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加恶性发展，大党主义变成了大国霸权主义。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又必然涉及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党与党间矛盾的加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在加剧，直到一个国家武装侵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败坏国际共运的大事情。

三是学习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

各人民民主国家刚刚建立，无所借鉴，当时学习苏联的经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苏联的模式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甚至连最早抛弃这种“模式”的南斯拉夫同志也承认这一点。但这种模式有重大弊病，生产效率低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做法。因而使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社会主义阵营国与国关系上出现了严重裂痕，学习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至今人们仍然可以觉察到。

四是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这里包括组织上、思想上的建设，根据我国情况来看，这里首先是个党风问题，我党十二大报告讲的很清楚，党风问题是涉及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认为，党风问题实质上是个党群关系问题。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领袖与群众关系上，领袖是人？还是神？干群关系上，干部是国家的主人？还是人民的仆人？从官民关系（其实也是干群关系）上看，当官者是人民的儿子？还是人民的父亲，老爷？我们党的干部应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改进自己的作风。彭德怀同志以民为天，严厉批评在正常行军中踏坏庄稼的干部战士。陈毅同志也是我们的好榜样。他有一首诗说得是何等好啊：“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都应该有这种思想、精

神状态，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人民服务员。

1982年9月召开的我党12大，是对我国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尤其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最深刻、最科学的总结，我党12大的决议必将对国际共运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②坚持各党独立自主、反对大党主义、老子党作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③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力求消除学习苏联模式带来的各种弊端。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抓的四件大事的第一件就是系统地完成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对中国四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将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推进国际共运的发展。

二、战后国际共运的分期问题

关于战后共运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以及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我们理论界、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粗浅认识。

我认为划分阶段的目的是为了对战后共运发展的历史进程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以对国际共运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的标准，使每个阶段的特点能有所区分。我认为战后30多年的共运史大体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①1945—1949年；②1949—1956年；③1956—1968年；④1968—至今年。1945—1949年是形成社会主义阵营时期，其特点是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讲，这段算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段起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所以把一段、二段并在一起不太合适。二、三、四段虽都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但因每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故可以划分开。

①、1945—1949年，社会主义阵营形成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彻底失败而告终，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

在东欧，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有七个国家（波、匈、捷、保、罗、南、阿）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欧，在被占领的德国东部，在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帮助下，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中欧东欧联成了一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各国间纷纷建立了互助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在亚洲，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朝鲜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越南经过1945年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加上原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样，中朝越蒙四国也联成一片，进一步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

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保卫了自己的革命成果，保卫了世界和平。

首先，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动了强大的和平运动。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妄图通过“经济援助”，在复兴欧洲的幌子下，占领欧洲，颠覆各人民民主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为此，1947年在联共（布）和斯大林的倡导下，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联合欧洲共产党人，共同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作斗争，保卫革命成果，保卫世界和平。当时情报局的机关刊物名称就是一句口号：《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反映了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指导思想。

其次，中朝两国人民共同进行了抗美斗争并取得了辉煌胜利；

第三，在社会主义各国支援下，越南人民于1954年取得抗法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在国际合作问题上，在发挥联合国作用问题上，社会主义

各国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团结了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支持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作为国际共运同盟军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战后也蓬勃发展起来。帝国主义殖民制度开始瓦解，战后东南亚许多国家，如缅甸、菲律宾，马来亚等国的共产党一直在坚持武装斗争，反对重新沦为殖民地。有许多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在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下争得了独立。初步统计在40年代获得独立的有12个国家；在50年获得独立的有8个国家；在60年代获得独立的有37个国家；目前全世界获得独立的已达80—90个国家。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改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纷纷放弃人民武装，走上了合法的议会斗争道路。法共意共都提出为建立新的或进步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口号。实际上是建立与社会党合作的政府或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较，二战后，欧洲共产党人在斗争策略有一个大的转变，从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变为争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个新的课题。当然，这与战后革命大好形势有关。

战后初期，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即希腊，没有放弃自己的武装，仍然坚持了数年的军事斗争。但由于大国的干涉（苏联不允许，美英帝国主义的镇压）和自己本身斗争策略上的错误，被迫于1949年10月16日宣布停止军事斗争。长达10年（1940—1949）的军事斗争结束了。

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曾大力宣传在美帝占领的条件下，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1950年情报局曾对日共进行了公开批评。这种批评曾引起了日本共产党的分裂，并促成了日共短时间的军事斗争，后来也失败了。日共有关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可见稻田里见：《我的战后经历》）以上是第一阶段的概况。

②1949年10月—1956年初，（即苏共20大前）是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时期：实际上是按苏联模式对本国旧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造时期。

战后所有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学习苏联的阶段，包括南斯拉夫在内。这个学习是必然的。因为老一代的共产党人中间普遍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把苏联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1957年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国必须认真学习苏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40年了。它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重要的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又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2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它友好国家的支援，日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2大报告也说：“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我认为就包括了我们讲的这段时期。

这个学习也是有成效的。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生产计划化——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建国后我们把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矿山、河流国有化作为社会化的一种形式，这有马克思主义根据，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国有化是否是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最好的形式还是可以研究的。又如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专业设置、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等等，从不会到会，学习苏联也是必要的。

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被学习者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强行推销苏联模式，合我者是，逆我者非，一切以苏联“模式”为准，一切照办就算搞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违背社会主义。这是十分荒谬的。我们常说条条道路通往社会主义，而不是条条道路通往莫斯科，不能说，莫斯科就等于社会主义。苏联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一切以苏联为准，就违背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别国先进经验与本国实际

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这就必然会同各国共产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的第一次公开暴露，就是1948年的苏南冲突，导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宣布南斯拉夫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宣布南共无权称共产党等等，这场冲突，今天看来，正确的不是苏共、不是斯大林，而是南共、是铁托。这场冲突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与本民族特点结合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各党自主的权利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铁托、卡德尔在1948年4月13日致苏共中央信中讲得很清楚：

“我们把苏维埃制度作为一个榜样来学习。不过在我国，我们正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目前时期，我国正处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考虑到解放后出现的国际局势，我们正竭力采用最好的工作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战后世界历史长编》（4）266页）伟大马克思主义者铁托的英明之处，就在于它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顶住了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压力，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为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毛主席称赞“铁托是铁”，是完全正确的。在这场斗争中很多国家党的领导人受到株连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从另一方面说，从学习者方面来说，自身也存在着问题，就是教条主义的照办照抄。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苏联早期发展中有其必要性，对苏联来说，它不是任何时期都必须遵循的经济建设方针，它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更不能象苏联某些的经济学家们讲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经验证明：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会造成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的失调，为生产进一步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又如片面强调农业集体化，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与劳动集体化混淆起来了。其实这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推行生产责任就解决了这个矛盾，从而农村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又如领导国民经济过分集中、统的过死，助长了官僚主义等等。所以这个时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效率很低，物资不丰富，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如波兰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工人们实际生活生活水平下降了，如1953年与1949相比，每月平均工资买牛肉可少买37%，

买火腿要少买39%，买猪肉要少买19.4%，买糖要少买26%，买面包要少买16%，买煤要少买32.6%，生产水平也下降了，1955年比1949年矿工每日采煤量下降12.4%，比1938（二战前）还低36%（哥穆尔卡：

《关于目前波兰形势》P.2）这就是学习苏模式带来的严重弊病。所以凡是苏学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一个国家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毛主席在1956年及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关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1949—1956年，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是沿着两个模式在发展，一种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种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发展。按南斯拉夫自己的总结，自治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6年这段时间里自治制度处于第一阶段（1950—1964）。

③1956.2—1968.8月，国际共运新的转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尝试。

1953年斯大林逝世了，对整个国际共运产生极大震动。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片面鼓吹和平过渡，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未与各国协商，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是很错误的。本来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于国际共运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大反斯大林，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在国际共运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在苏共20大后，引起了波兰局势的动荡，1956年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在匈牙利，由于过去学苏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加上反革命的煽动，西方帝国主义的插手，终于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给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损失。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要长期才能恢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部分）苏共20大也引起了全世界性的反共反人民的风潮，在一些国家的青年人中出现了“信仰危机”、老年人中出现了所谓“良心危机”。有一批动摇分子在这个风潮中退了党。（说明这些人缺乏牢固的共产主义信念）。

苏共20大加剧了国际共运中的矛盾和分歧。围绕着反对老子党、指挥棒问题、消灭个人崇拜影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问题，十月革命道路问题，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等等，国际共运中发生激烈争论。1956年月4，我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文，1956年12月我党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长文，“一论”、“再论”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巨大反映，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许多方面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论点。但是苏共不遵守通过的宣言，继续散布他们的观点，并采取一系列恶化中苏关系的措施1963年3月发表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对中国共产党恶意攻击，并散布了一系列错误的论点。为答复苏共致中共中央的信，1963年6月14日我党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做为对我6月14日信的答复，接着苏联全国报刊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为此我党从9月6日起至64年7月14日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中苏两党进行了公开论战，从而加剧了国际共运的大分化，大改组。赫鲁晓动员许多国家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上围攻中国共产党，本想一举使中国共产党就范，但同赫鲁晓夫的愿望相反，反而使他自己反华面目大暴露，于是一些不同意赫鲁晓夫观点的人开始从旧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另立新党，一般称~~××党~~（马列）这些新党多数是亲华的，老党中多数是亲苏的，1964年赫鲁晓夫国内外交困被赶下了台，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胜利。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而且变本加厉，1965年3月1—5日接着赫鲁晓夫的遗愿召开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参加的有19个党。中、朝、阿、越、罗、日、澳、巴西、印度等国党未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从组织上分裂了共运队伍，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从此，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了，统一的国际共运已不复存在。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打掉了苏共的老子党、指挥棒，促进了各国的思想解放，从六十年代起，东欧许多国家开始了经济改

革的探索。东德从1963年开始改革，1963—1967年被称为新经济体制时期；捷克斯洛伐克1965年1月通过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主要方针》的决议，以完善自1958年以来开始的改革；匈牙利1966年5月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保加利亚从1966年起在一些部门推行“国民经济新体制”；苏联也从1965年起开始对1957年的改革进行调整，对自己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

④1968.8—今。东欧各国经济体制和国家体制的全面改革。苏联霸权主义的恶性发展。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从1968年以来，国际运中逐渐形成了两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整个国际共运来看，由于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使自己霸权主义的面目大暴露，从而引起国际共产主义中力量新的结合。在国际共运中逐步形成独立自主的巨大潮流；同时，共产党执政的许多国家掀起经济改革和国家体制改革的热潮。尽管这种改革有国内保守势力和苏联霸权主义者的反对，有的国家在改革中也出现不少的问题，但改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因为推动改革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愿望。匈牙利1968年1月起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日本学者研究，认为匈改革搞得比较好，认为它有三个特点：①同苏联妥协；②党与人民妥协；③人民与官僚体制妥协。这个分析是否妥当还是值得研究的。保加利亚从1969起对新经济体制作过部分修改，1978年进行了总结，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和改进经济领导》的决议，1982年1月起在“全国社会—经济的一切（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中实行新经济体制”。东德1968—1970年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期（实行国民经济分权管理）。

所有这些国家的改革，各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共同点，就是强调物质刺激原则，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分权管理，改变过去过分集中的领导。这些改革不是个别的、局部的，而是带有全局性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劳动组织、计划制度、价格政策、税收制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企业的收入与分配等等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从1968年起也进一步改革。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

尼，任捷共第一书记，通过了《四月行动纲领》想把1965年以来的改革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并同西德经济谈判。想在捷克建立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想把亲苏人物统统换掉，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自由化现象，如当时在布拉格流行着一份“两千字宣言”——《给工人、农民、职员、科学家和所有人的宣言》。这篇宣言是由小说家卢德维克·瓦丘利克所写，有70多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签名。宣言称捷是强权组织，对捷共的《四月行动纲领》不满，宣言号召撤换保守分子，号召人民管理报低，设立言论自由委员会，揭发告密者，提醒有外国干涉的可能性，要求只要政府按人民的委托办事，人民将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苏联由此抓住把柄，大造干涉的舆论，说这些人是想推翻捷共，说甚至捷共政治局内也有人赞成“两千字宣言”，认为捷克局势特别危险，说捷共已控制不了局势了，苏联要“帮助”捷共去控制，同时拒不撤走军事演习时的军队。1968年7月，把波兰、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等国党的领导人召到华沙，五国共同商量对策，同时下令要捷共派人参加，但杜布切克借口没有接到通知，未去参加，主要是怕到了国外被抓起来。会上哥穆尔卡发言，批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说法，他说“难道说，社会主义不是最人道的吗？”指责捷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经济，说捷去与西方建立经济联系是打算抛弃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好证明，说捷正在发生反革事件。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其势汹汹地讲了一通，说捷领导再也控制不了局势了。他们离深渊只有一步路了。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必须给捷克以各种帮助，要求五国采取一致行动。乌布利希要求对杜布切克周围的所谓“修正主义”分子采取措施。卡达尔表现比较沉闷。最后决定给捷共中央一封信，表示这些国家党的疑虑，这实际上是一种最后通牒。后来许多国家还同捷共进行了双边会谈，均未取得具体结果。8月21日，在苏联操纵下苏、保、德、匈、波五国军队悍然侵入捷克领土，占领捷全境，把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以及捷国民议会主席统统抓了起来，苏向捷发出最后通牒，要捷另组新政

府，要求把布切克的支持者统统排除在外，开创了一群社会主义国家侵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恶劣先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人侵，要求华约五国军队立即撤出，尊重捷主权，捷各地群众举行示威抗议人侵，高呼：“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苏联侵略捷克事件，引起全世界和整个国际共运的巨大反响。苏联的侵略行动受到了各国党的谴责，原来支持苏共的一些党开始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经。8月22日罗共中央、国务委员会及政府发布公报认为“人侵行动是侵犯捷主权和违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要求苏联等国撤军。8月23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罗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强烈谴责苏侵捷罪行，指出苏共领导集团已惰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9月12日，阿尔巴尼亚正式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表示对苏侵捷的抗议。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共产党联合欧洲17国党抨击苏人侵捷克。1969年3月苏联霸权主义者悍然侵略我珍宝岛，勃列日涅夫的新沙皇面目暴露无遗。

同时帝国主义阵营也是四分五裂，西欧、日本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发展，世界上形成了互相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世界。因此，1974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同卡翁达谈话时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是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见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三个世界的理论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

各国党在反霸斗争中，又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共运又有新的分化、改组。60年代以来，新党、老党都在不断变化。政治态度也不断变化。有的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的与我们分裂了。如越南，1975年抗美结束后，在苏联支持下，在我国边境不断制造事端，大搞地区霸权主义，忘恩负义，把中国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来反对，1979年2月

我国被迫自卫反击。又如阿尔巴尼亚，疯狂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恶化中阿两党两国关系。有的新党在组织上不断分裂。有的一分为二，为三，为四，如日共左派分裂为四：日共（左派）中央临时指挥部，安斋的日共（马列）全国委员会、板井庄作的日本工人党，大隈铁二的劳动党等。有的党分裂为五，甚至为11，如孟加拉国的共运。这也是真正的四分五裂。

不可忽视的是，66—76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场大灾难，对国共运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有的党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有分歧而分裂，如日共、阿根廷共产党等。有的学习文化大革命一套做法，搞什么“四大”，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柬埔寨获得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不久，于是柬共也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不要工业，不要城市，男女分别编队、儿童入托、一律吃食堂，实际上消灭了家庭；劳动时不计工分，实际上也是吃大锅饭；打击知识分子，以致学校无教师、课本，开不了学、肃反、统战问题也有错误，直到纠正这些左的东西以后，才开始劳动时评工计分，自己做饭吃，才家家升火，户户冒烟。柬共虽然斗争很英勇，可是由于这些左的错误最后不得不解散。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如利比利亚的卡扎菲也搞有文化大革命，号召“赶快夺权”，宣传“开创了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把一些所谓堕落的和异端书籍统统烧掉，只留下圣经、伊斯兰教历史、文法的书籍，这是名副其实的革文化的命。

当然国际共运中左的思潮，不仅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关，与格瓦拉的思潮也有关，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由于受格瓦拉“游击中心”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过左的活动，有的国家共产党搞什么农村游击中心、城市游击的中心，不依靠群众，而是靠暗杀等恐怖活动。这对共运的发展是极不利的，但格瓦拉的弟弟，不同意说格瓦拉主义就是游击中心。对格瓦拉主义说了很多溢美之词。

1976年10月，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1978年我党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内对外政策是个